

马克思恩格斯怎样对待历史文件

——重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

对待历史文件采取不同的态度，反映不同的思想路线。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 韩云川

历史文件是历史上形成的公文、书信以及有关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和某些视听材料等历史资料。历史文件是一种客观存在，反映的是历史事实以及当时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对待历史文件采取不同的态度，反映人们不同的思想路线。

对待历史文件采取主观臆想的态度，任意剪裁、任意篡改，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映。这种态度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使人们不可能认清历史的原貌、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待历史文件采取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句话，采取老实的态度，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映。这种态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使人们有可能认清历史的原貌、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的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理论和实践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宣言向全世界公开宣示的，所以，《宣言》的发表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德文版《宣言》写了一篇序言。这时，《宣言》发表近25年了，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间还爆发了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顾了《宣言》产生的经过以及25年来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指出《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强调理论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并根据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对《宣言》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了他们对待历史文件的严肃的、科学的态度。他们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也就是说，历史上形成的文件要保持历史的原貌，要对历史负责。他们打算在下次再版时加上一个导言，有些问题在导言中进一步加以阐述和说明。由于各种原因，原来设想的导言后来并没有写。但从这篇序言和后来的六篇序言以及《宣言》正文的注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对《宣言》本身来加以修改，而是通过序言和注释来进一步阐述、说明《宣言》的有关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对于这些过时的地方，他们不是修改《宣言》的原文，而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比如，他们指出，《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

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因为这十项措施不是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具体措施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应该采取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办法和措施。再比如，他们认为，由于有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里主要说的是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问题。因为当时写作《宣言》的时候，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所以《宣言》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地阐明。还比如，他们指出，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只到1847年止，在25年后看来，这个批判就是不完全的。如果要作完全的批判，就要增加大量的篇幅了。此外，他们认为，第四章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部分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意见就其实际运用来说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对于《宣言》本身有些明显错误的表述，他们也不是通过修改《宣言》本身来解决，而是通过注释来加以说明。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开头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严格地说，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因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不存在阶级的，当然也就谈不上阶级斗争了。难道原始社会的历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作《宣言》时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意

思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在《宣言》后来再版时将这句话改为“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阶级斗争的历史”完全正常，这也是他们当年写作《宣言》的原意。但这样一改，人们就会问，怎么把概念偷换了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加注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88年《宣言》英文版上就在这句话后面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之真正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

加了这个注释，不仅准确地表达了当时写作《宣言》的原意，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很多问题。

第一，它使我们了解到，人们什么时候才认识到人类社会曾经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在今天看来，人类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还没有达到这个认识水平。人类社会曾经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是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才发现的。恩格斯



的这个注释大体上揭示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

第二，它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得到这个知识的。从恩格斯的这个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通过研究当时有关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得到这一知识的。恩格斯在1884年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这一著作当时在欧洲很少为人所知，而坚持所谓家长制理论的学者对摩尔根的发现又故意不提。马克思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研读了摩尔根的这一著作，并写下了十几万字（译成汉字）的读书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摩尔根的发现提供了根据具体历史材料阐明地区共同体和国家产生的途径的可能性。马克思就曾打算联系摩尔根的

研究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马克思的这一计划后来是由恩格斯实现的，他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的上述读书笔记。

第三，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人独立地重新发现了唯物史观，并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恩格斯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重读经典

用典释义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讲话原文】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社会做表率。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年12月12日）

【出处】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春秋至秦汉）《礼记·大学第十章》

【解读】

《礼记·大学》是儒家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关系的政治哲学论著。儒家以家庭为政治的基石，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教导不好家人却能教导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认为“齐家”是“治国”必不可少的内容、前提和基础性环节。

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讨论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展开。《礼记·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这一思想的精辟概括。在儒家看来，“治国”必须从“齐家”开始，同时“治国”和“齐家”也是同一的，只不过范围大小有别而已。《礼记·大学》称：“故治国在齐其家。”“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宣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这种家国同构式的治理方式，直接把关于个人家庭伦理准则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

惟其如此，在中国，家风家训也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能，这主要通过“修身、齐家”间接来体现的。北宋司马光的《家范》也引述了《礼记·大学》中的这段话。

（杨立新）

中国传统治理中的识人之道

用人的前提是识人。不能识，如何用？识之有偏、有误，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

□ 陈家兴

民意怎么听

治国理政，人才为本。“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用人的重要性，自古而今可谓至深至明。然而，知人之难乃是古今治理的第一大难题，如司马光所言“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从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看，这一难题始终都没有“最优解法”。了解历史上的识人之道，对于我们今天做好人才工作大有启发。

推荐与明察

古人尤其是君主用大贤的，多重他人推荐、自己明察，或这两种办法组合使用。倘若君主不加详察，他人荐贤往往就会私恩盛行，而致庸人塞路。但当面详察，要求用人者本身就很贤明，有雄才大略。他们往往思考治理难题夜不能寐而求之于人，若所答能令己茅塞顿开就会引为高贤。历史上，齐桓公之与管仲、秦穆公之与百里奚、秦孝公之与公孙鞅，都有所谓三天三夜长谈的故事。但若为庸主，即便是贤才他也不鉴识，有贤能他也不善用，而贤才也会弃他而去。比如鲁庄公之于管仲、魏惠王之于公孙鞅、项羽之于韩信、袁绍之于荀彧。

刘邦用人尤其注重在实践中看实绩。萧何、周勃，起事时就在一起，可谓知根知底。张良、陈平是后来投奔，刘邦也是见到他们谋略的效用才逐渐起用的。刘邦甚至不太相信引荐这种方式，他不想把无能之辈用到官位上空享爵禄，即便如萧何这般重臣所荐，他也未敢轻信。萧何就多次向刘邦推荐韩信，但总不予重用。以致萧何追韩信，才触动刘邦，最终答应让韩信当大将。但在设坛拜将之后，刘邦还要一试韩信有无真本领：“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刘邦听了韩信的一番话方大喜，才“自以为得信晚”。

借助人才的名声与业绩考核的办法可以识别人才。然而，司马光指出过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糅；考之于功绩，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意谓靠舆论的毁谤或赞誉，就会有个人的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而用功劳簿进行考核，就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千载以下，可谓至理。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甚是明察。他曾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安居乐业，官府平安无事，东方十分安定。“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万户俸禄。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鄆地，你坐视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闻不问。“是子厚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虚作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强盛的国家。

这说明，完全靠名声评判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察干部，重视哪个群体的意见，很关键。如果只是听自己身边人的意见，觉得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看似身边人与考察对象没什么关系，却往往在实际上下大有干系。作为领导者，最忌通过自己身边人的臧否，来判定谁可用谁不可用。

对不同范围的民意，孟子早就说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里，孟子提示了一个更大范围，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广大群众。

绩效怎么考

三国时期的魏明帝痛恨浮华之士，对吏部尚书卢毓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于是让散骑常侍刘劭制定考课法，刘劭制定了《都官考课法》72条供百官讨论。

群臣对这种考绩之法，多有非议，傅嘏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这种考绩是治国的细微末节，“本纲不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结果久议不决，事竟不行。

的确，这种考绩的具体工作繁琐庞杂，最后形成分数，多一分者就比少一分者优秀？当然未必，而且很容易被用来作弊徇私。

司马光就此事写过一段很长的议论。他认为识人之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意谓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属下能否胜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就会成为徇私、欺瞒的凭据。这个道理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比较在理。

司马光认为，“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

